

書評

發大哉問、究根本論、提出路解：經濟社會學的大用 \*  
Fred Block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7p.

謝國雄 \*\*

發大哉問

C. W. Mills (1959:6-7) 認為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社會學家，都要不時地問自己：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的結構是什麼？這個社會站在歷史的什麼階段？它可能往那個方向走？它生產出了什麼樣的男女？這三組由社會學想像力所激發出來的問題—結構、歷史與人，久為一般社會學家所遺忘，但在 Fred Block (1990) 的這本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中被重新提出，而以新的視野來處理新的問題。

這本書可以分成幾個部份來看，而這樣的安排也透露出作者

---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於 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邀請 Fred Block 來台發表三場演講。本文是應此活動而作。感謝吳泉源教授的建議。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鋪陳論證的策略。第一部份是有關社會理論的探討，第二部份是從經濟社會學中汲取理論觀點與工具，批判當前主導的社會理論，第三部份則是對當前主導的社會理論（即新古典的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範疇，提出根本性的批判，最後一部份則提出替代性的社會理論。確立分析焦點、磨利分析工具、先破後立，尤其是「立」，構成了這本書很重要的基調。

首先要區辨「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與「社會學理論」。Block 這裡的「社會理論」，指涉的是有關「我們生活在一個甚麼類型的社會」的想像。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社會」、「工業社會」、「大眾社會」或是「資訊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理論」為什麼這麼重要？首先，認知我們所生活的社會，需要藉助「社會理論」；透過「社會理論」，我們（包含一般成員與社會學家）才可能理解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其次，這是因為「社會理論」具有定義社會現實的效應。一旦我們將眼前的社會定義成「市場社會」，那麼接下來的各種抗爭、改革、爭辯就會環繞在「市場社會」所蘊含的主要概念上：這樣的抗爭、改革與爭辯不吻合這個主要概念？我們所設計的制度與這個主要的概念相容嗎？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認定眼前的社會是一個「工業社會」，是一個以持續提高製造業的效率與擴大其範圍為原動力的社會，那麼社會鬥爭與社會改革都不脫此一架構 (pp.8-9)。簡言之，社會理論具有建構社會秩序的效應，本身就是社會秩序的一環。

這樣的觀點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含意：如果社會學家從建構社會理論的戰場上撤退，那麼一定會有社會理論的替代品出現，用以彌補社會成員對社會理論的需求，這是因為不論一般成員或是決策者都需要「眼前的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的理論來指

引他們日常的行動。最清楚的一個例子經濟學的想法（尤其是前凱因斯的經濟學想法）填補了當代社會學家在社會理論上的沈默 (p.2)。特定類型的經濟學理論取代了對社會的一般性理解，結果是：如果社會學家不提出社會理論，或者社會理論失去讓社會生活的意義呈現出來的能力，那麼被淘汰的、過時的、單薄的理論就會乘隙而入。以白話來說，敢講敢贏：大聲說出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應該走朝那個方向走？講了不一定贏，但不講一定沒有贏的機會。

在這個節骨眼上，Block 一方面點出了社會（當然是美國社會）的發展新趨勢，另一方面則指出這些新趨勢超越了「工業社會」（及其旗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所以需要有新的社會理論。Block 在這裡試圖復興「後工業社會」的社會理論，揚其長而去其短。

促使 Block 去建構一幅有別於當前「工業社會」的動力，除了上述對於「社會理論」的重要性的認知之外，是他對美國社會一些發展趨勢的掌握。這包括了：服務業的比重逐漸增加、電腦帶來的自動化，以及父權制的式微與線性生涯的改變（如離婚率的增加與中年轉業的現象）(pp.10-11)。由 Daniel Bell 所提出的後工業社會理論似乎是應這些趨勢而生，但這種版本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流於演化論、決定論與樂觀論，素為社會學家所不喜。所以必須對「後工業社會」理論進行改造。

Block 依循三個步驟來改造。首先是深刻分析社會生活中發展的趨勢，用以找出萌芽中的變遷。其次，點出這些發展的趨勢與工業社會理論所用的概念範疇之間相衝突的地方，目的在指出舊有概念範疇之不足，並進一步指出這些概念範疇消逝後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效應，從而撐開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空間。最後一個步

驟則是依據興利去弊的原則來構想新的概念範疇與新的制度生活 (pp.13-14)。趨勢的掌握、概念範疇的批判與替代性空間的勾繪三者構成了 Block 研究的主要策略。這三個步驟在操作上其實是環環相扣。以主導的社會知識——經濟自由主義來說，它偏好以市場機制分派資源，強調硬體資本是增產的手段，預設了受僱者要服從雇主的權威。如果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應的「工業社會」已在轉變，那麼上述的「共識」是否也應該被改造？而從前在工業生產主導下被視為不可能的特例、意外，是否也應該重新被考量？

### 究根本論

這樣的操作，當然需要有理論觀點與工具來幫忙。作者所藉助的是經濟社會學的傳統。社會學的古典大師 (Marx, Weber, Durkheim) 無不探究經濟現象。但社會學在美國的發展，卻為了取得制度化的地位而做出妥協，被迫只能探討經濟學、政治學研究剩下來的議題，如家庭、社區、都市等。這可以從探討經濟現象的社會學家將這個領域稱為「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中看出：經濟學與社會學是兩個分立的領域。這個妥協在 1960 年遭到左派與女性主義的挑戰：前者因為對權力與資源分派的關心而深入探討經濟過程，而後者則對「什麼是經濟」提出質疑。但這個契機並未讓經濟社會學發展出系統的觀點、議題與對領域的認同。相反的，卻有來自經濟學的擴張：以經濟學（特別是個體經濟學）的工具來研究非經濟現象（如 Gary Becker）。

經濟社會學的質變與茁壯是來自一群持「鑲嵌論」(embeddedness) 觀點的社會學家。「鑲嵌論」指出：經濟行為植基於社會與文化的架構之中，經濟學的分析將經濟行為從這這個架構中抽離，從而不能掌握到經濟及社會生活的複雜性 (pp.38-9)。鑲嵌論

可以追溯到 Karl Polanyi (1886-1968)。Polanyi 區辨「經濟」的兩種定義：形式定義指的是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運用，而實質定義則是人類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來滿足物質需求。後者可能是人類社會的普同現象，但前者則不然。經濟學將這兩種定義的經濟等同起來的作法，必須被糾正。

其次，Polanyi 認為國家的干預與福利的供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環，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放任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其結局是自我毀滅。因此英國十九世紀的放任主義運動 (laissez-faire) 與保護性的對抗運動（如工會與國家的規範）二者同時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保護性的對抗運動（被認為「非經濟現象」，甚至是對經濟的干預）並非外在於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

「鑲嵌」的意義在此得到最好的展現。甚至「鑲嵌」都不足以掌握「經濟」現象與「非經濟」現象間的關係；「互構」說不定更能傳達 Polanyi 的意思。在十九世紀初期有關「市場形成」的論戰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可以帶來繁榮，所以就減少國家干預，好讓市場形成。但 Polanyi 的看法卻是：恰恰正是因為國家的介入，所以市場才得以形成。濟貧法的制訂與變革迫使百姓不得不進入工廠謀生，同時也促成了勞動力市場上的流動；而工廠法的制訂則限制了工人的工作的時間，以免資本案因競爭而殺雞取卵，摧毀了整個勞動力。除了國家的介入外，文化的因素也促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誰可以、誰應該進入勞動力市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其實是受到文化規範的。

Polanyi 的洞見將新古典所預設的背景因素搬上檯面，視其為市場運作不可或缺的條件。沿著這條思路所發展出來的觀點就是從市場、國家及社會規約三者間的關係來考察經濟現象。這是

Block 的經濟社會學所藉助的理論觀點。簡言之，他認為經濟涵蓋了三個不一樣的面向：個體經濟的選擇、國家的作為、與社會性的規約。在個體經濟選擇的層次，市場只是建構選擇空間的一個機制，但並不是唯一的機制。比如在解體前的蘇聯計畫經濟中，企業選擇的誘因並非來自市場，而是達成計畫目標。在國家作為的層次，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有關契約與財產權的法律，是保證所謂「自我調節的市場」能運作的基本條件。最後一個層次是社會的規約，主要的內涵之一是各種組織內各個成員互動的規範。

凸顯這三個分析層次作重要的含意在於：到「效率」之路並非只有一條，而是有各種制度性的組合，用以協調這三個層次的運作。講的白一點，就是「路是無限的寬廣」。以當代社會的轉型來說，最值得注意的生產過程當中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在工業社會中，生產者被看成是一個一個的加工機器，與一般物料沒有兩樣，從而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就是沒有「社會關係」這個要素。但在「後工業社會」中，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沿著「鑲嵌論」的路子走下來，顯然這是必然的結論，從而也是理解「後工業社會」最適切的理論工具。

於是新古典經濟學不論在方法上或是在歷史事實的發展上都站不住腳。新古典經濟學預設了經濟現象是與其他現象分離，而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新古典經濟學並非看不到國家作為、社會性規約或是文化架構的重要性，只是將這些因素視為「背景因素」，存而不論。有些經濟學研究注意到這些因素，但是以「放進去攪和」(add and stir)的方式來處理。這樣的處理方式會誤導思考的方向，從而也會找錯答案。但依經濟社會學的觀點，這些背景因素，並非僅是「背景」而已，而是經濟運作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無論偏好的形成、追求最大利潤、什麼樣的工作是有酬

的，什麼是無酬的等問題，都不可以視為當然，存而不論。

在分離論與追求最大效用的預設下（這就是所謂的「唯經濟論的謬誤 (economistic fallacy) ），新古典經濟學塑造了「錯誤的必要性」(false necessity)，而這「錯誤的必要性」則是來自對經濟的「自然化」觀點 (a naturalized view of economy)。將具有特定歷史與特殊情境的經濟體系，視為一個亙古長存、圓融自足的現象，而且這個經濟體系必須滿足有效分配稀有資源的需求 (p.26)。在這樣自然化的觀點下，對經濟體的任何改變，都會損及其效率，從而將低生活水平 (p.28)。經濟社會學直接了當的回應是：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來滿足經濟上的需求。這種「去自然化」的批判觀點，與 Bourdieu (Bourdieu et. al., [1968]1991:1-55) 的「與現象斷裂，探討現象被建構的過程，從而重新建構研究對象」的策略，異曲同工。

經濟社會學同時也挑戰了構成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構成經濟學現象的數字。以會計來說，一筆支出，到底要放在那一個科目，並非那麼客觀：它可以是眼前的一種支出，也可以是一種資本財。最後的決定都有武斷的成分，而這些數字卻構成了一個企業盈虧的指標，也構成了國民會計等「社會事實」(pp.31-33)。當我們以這些「社會事實」來理解社會、診斷問題、提出對策時，別忘了這是由一套具有武斷成分的分類架構所製造出來的數字，而這個分類架構是一種集體的信念的產物，與我們區分什麼是可吃的，什麼是不可吃的食物的架構，其實是沒有兩樣。

於是在做根本論究時，Block 展現了對歷史情境的敏銳，對「背景」因素的掌握、以及體認到「理念」對經濟行動的影響力。在這樣的認識下，他對經濟學的四個主要概念範疇，提出批判：市場、勞動、資本、與產出。

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模型是一種「即期市場」(spot market, 例如股市)但在現實中吻合這種模型的經濟活動其實不多。因此, Block 發展出「市場性」(marketness)與「工具性」的概念來測度現實。前者指的是行動者對價格訊息的反應程度,後者則指的是行動者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利的程度。比較美國 1850 與 1950 的狀況,他得到的結論是:一、這兩個時期的市場性與工具性其實沒有多大的變動。1850 年的農民試圖用各種方法保護自己免於市場波動的侵襲,而在 1950 年,公部門的擴張、軍需產業的增長、大企業的茁壯、與專業主義的興起,在在都是在箝制市場機制的橫行。第二、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是與低市場性並存的 (p.66)。

除了比較歷史的批判之外,「市場模型」本身也有其邏輯上的矛盾。在工具性的預設下,機會主義將會盛行,結果將是市場機制無法進行。再者,如果勞動力市場依即期市場的模型來組織,結果將是:受僱者無誘因認真工作(因為他們將隨時在搜尋更好的工作)、沒有動機分享工作知識、以及雇主無法知道生產問題的所在。如果將企業本身視為即期市場的商品(如併購、脫手),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受僱者人人自危,長久的工作關係無法維持,則一切企業運作也就免談了。簡單來講,如果按照即期市場的模型來運作,這個社會一定會垮掉。

勞動經濟學一般都不處理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係」,也視「受僱者要服從雇主的權威」為天經地義。Block 認為後工業社會的生產自動化、彈性化,會使得受僱者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形重要,而善用這種能力的前提是一組勞資合作的關係。只有在這種合作關係中,才可能滿足後工業社會對技術的高要求(由對剩餘的萃取轉變成對「注意力」的萃取)。

同樣的,在後工業社會中,資本的概念也必須修正。傳統的

「資本」概念,是一種「靜脈注射」模型:有形的硬體資本是活命的要素,必須注入經濟活動中,才能使經濟體活絡。但在後工業社會的脈絡中,組織因子的重要性躍升。「資本」適切的概念應該是:包含了可見的硬體資本,及讓硬體資本運作的組織情境 (p.121)。同時,硬體資本的單位成本會依科技的發展而降低 (capital savings),使得低價格、高效率的設備更為可及。相形之下,組織因子的角色更形重要。

組織因子涵蓋了:受僱者的動機與訓練、集體學習的設計、品管制度、原料及庫存的管理、彈性因應市場的安排、安全衛生的防範、生產前後的安排等。隨著後工業社會的情境深化,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將會逐漸凸顯。比如說,疏失、錯誤的代價將十分巨大,所以更要以組織設計來防範。

將這樣的觀點運用到衡量企業表現的會計帳上,在概念上就會發生重大的變革。於是在成本欄中,除了硬體資本之外,也要涵蓋在組織安排上的付出;而在收益上,則除了價格的考量外,品質、彈性、安全、集體學習的成效等,都必須納入。推到極端,將使得成本/效益的二分法技窮。

如何衡量經濟上的「產出」(output)呢?一般是以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來測度。但 GNP 未能測量到:家戶內的生產、休閒的價值、工作本身非經濟性的滿足、以及生產的外部效應。即使 GNP 資料本身都有測量上的問題,諸如:無法測量「質」的面向,無法區辨消費與生產相關連在一起的經濟活動(如:生產性消費一如教育、醫療,一方面是消費,另一方面則是有助於生產力的提昇;以及消費性生產—工作本身所帶來的樂趣,是在生產過程中的消費)等 (pp.168-177)。其結果是 GNP 的測度與主觀上福祉的感受脫節 (pp.178-187)。

## 提出路解

批判完了，再來呢？Block 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批判而不提出替代性的想法與方案，在最好的情況下，是一種學術性的操作；但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強化現況是不可能改變的想法」（p.189）。出路在於「質的成長」（qualitative growth）。Block 首先指出這個替代性方案的指導性原則。第一、人的能力的拓展要與未來生產的發展間形成良性循環。第二、提昇經濟產出質的面向，包含商品無法提供的滿足。第三、揚棄「非市場即國家」的黑白邏輯，而以混合型的制度性安排代替，隨時調整因應新的情勢（pp. 194-8）。

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Block 分別對工作場所、勞動力市場、創新的點子、及消費與投資決策之間的協調提出建議。在工作場所上，沿著前述技術需求的提昇與合作關係的著重，必須採取三個方向的改革。第一、要有發展工作生涯的進階管道以及工作上的保障。第二、企業內的決策必須民主化。第三、員工入股制的推行。在勞動力市場上，則要推廣基本收入制（basic income）—任何一位社會成員，不論有無工作，不論身份地位，都有一份收入，足以保證其基本生活水平。就受僱者而言，有了收入保證，就可以選擇從事非市場性的活動，而雇主為了吸引受僱者，則必須改善勞動條件。所以在基本收入下的勞僱關係，合作的成分會大大的提高：接受有酬工作是出於自願，是因為工作本身的吸引力而來（pp.199-206）。

後工業社會中創新的點子特別重要，因此 Block 認為要讓創新的點子「去商品化」，讓它自由流通運用，才能日新又新。最後

一點，在消費與投資的協調上，公私部門都要朝參與式民主推進。私部門的民主化，會讓前面所關心的組織因子成為企業決策的考量（從而重新建構「利潤」的概念），而公部門的民主化則會加速對各種不同需求的敏銳反應。公部門更可以透過各種方法，強化企業在履行公共目的上的角色（諸如兩性平等、安全衛生、環境保護等）（pp.208-216）。

總言之，「社會變革需要廣泛的社會運動來推動。這些社會運動是否會出現，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人們如何思考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如果我們仍沿用工業社會的舊概念範疇來思考，那麼社會變革的空間就會受到限制，而社會運動也失去了其動力。批判過時的想法，正可以拓展改革的空間」（p.218）。

## 切磋琢磨

在學術上與實踐上，這本書都給了我們相當有意義的啓示。然而，我們也有一些批判。在學術上，我們要思考的是：作為一本經濟社會學的著作，這本書展現了那些經濟社會學的長處？首先，到底經濟社會學中的「社會」是什麼意思？大概沒有社會科學家會置「社會」於不顧，有差別的地方在於如何處理所謂的「社會」因素。最常見的一個作法是將「社會」視為一個背景因素，是一個可以與經濟現象分離，而且居於臣屬地位的因素。這是前述新古典經濟學分離論、自主論的觀點。第二種不同的看法來自「鑲嵌論」的看法，認為經濟行為是立基於社會關係之上。這種看法比背景論更進一步，已經將「社會」的地位提昇到接近「必要條件」的地步，但是仍未脫離臣屬於經濟的地位。最後一種看法可以，我稱之為「構成論」，「社會」因素是構成「經

濟」的一個要素，缺其不可，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如果硬要將此「社會」要素去除，則會走向自我毀滅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下，「經濟」沒有「社會」不但無法運作，而且會垮掉。Block 的立場，依我看是接近「構成論」，但他自己卻未明白的揭櫫出來，而不時有「鑲嵌論」弦外之音（如未區辨「鑲嵌論」與「構成論」二者的理論立場，pp.38-9）。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為要直接面對主流的經濟學講法，「鑲嵌論」是不足的，只有 Polanyi 傳統下的「構成論」才足以提供有利的理論工具。

那麼到底什麼是經濟社會學的「社會」呢？第一個內涵是人際關係，如在工作生涯所建立起來的「人面」，會影響勞動力市場上的流動與謀職這種「經濟」行為。其次，「社會」也指向經濟行為中在資訊上的關係。第三、經濟行為中蘊含的「權力」關係也是所謂的「社會」要素，如在勞僱關係中因必須出賣勞動力的壓力所帶來的不平等關係，以及孤立的消費者與壟斷的大企業間的不平等。第四個面向則指向國家的作為與介入。例如有關契約、物權法制及各種「去商品化」的作為。這個因素常被視為「法律」或者「政治」，但卻是經濟社會學最常處理的一個議題。在這個意義下，「社會」包含了「政治」，可以說：「政治性的」因素就是「社會性的」因素（The political is the social）。最後一個有關「社會」的意義則涉及價值判斷。「社會」因素中有為人所喜與為人所惡者，前者如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互信、承諾的關係，後者如全然的服從雇主權威、投機違約等。

「社會」的這五個意義都出現在 Block 的這本著作中。因為 Block 主要的對話對象是新古典經濟學，所以他會依批評的需要，隨意的引用「社會」這五個意義來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不足與謬誤的地方。在這裡他其實可以更有系統地處理這五個「社會」的意

義，並且在與經濟學對話的「敵情意識」下，對這五個「社會」的意義作更細緻的內部處理。

在實踐上，這本書也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啓示。學術研究工作也具有運動效應，這是這本書很清楚的一個訊息。勾繪社會發展中逐漸在萌芽的趨勢並解讀其意義、批判習以為常的「社會理論」、提出替代性的概念範疇與觀點都具有鬆動社會制度與現實的作用。揭穿、去迷思、開拓理念一方面能在形塑社會現實上發揮力量，一方面則替推動改革的社會運動拓展更寬廣的思考空間。這是學術研究工作的運動效應的兩個意義。師承 Block 的清大社人所的吳泉源教授在有關台灣儲蓄的研究及兩性工作平等法的批判上，是一個本土的例子。

其次，從「市場性」的概念以及「微觀選擇、國家作為、與社會規約的制度組合」的觀點，可以推論：漸進改革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即使將社會做全盤翻修，翻修完之後的改造工作仍然是要對市場、國家作為、及社會規約做出最適切的制度性組合，而不是在放任市場與國家管制二者擇一。這大概也是為什麼 Block 以「後工業社會」，而不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為名的原因吧（pp.190-4）！Block 深信「社會理論」形塑現實的力量，直接迎戰主導的「社會理論」（即新古典經濟學），以「在不疑處有疑」的精神追根究底。雖然我們對於具體的制度性組合為何，仍不是完全清楚；但 Block 發大哉問、究根本論、提出路解的作為，值得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社會學家借鏡。

## 書目

-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ierre, Jean 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68]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